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

现在,中国融入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其合作态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积极。然而,美国和亚太国家却对中国日益壮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越来越感到不安。与以往相比,最近政界和学术界对中国遵守地区和国际准则状况的描述也不如过去乐观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其他国家很少讨论中国是否是所谓的“国际社会”一员的问题。但是自90年代初以来,学者和政界人士越来越多地指出,中国没有充分表明它会按照国际规则行事,因而必须以某种方式使它融入国际社会。近年来,美国国内有许多激烈的政策辩论,主题为能否接受中国这样一个不满现状的民族主义国家进入公认的国际社会。主张与中国接触的人认为,中国在经济规则领域已经融入了国际社会(如自由贸易和国内市场经济)。质疑接触主张的人则认为并非如此,一种理由是担心中国政权的性质(对于有些人来说,中国仍是红色中国);另一种理由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感到不满(这是权

* 本文曾发表在 *International Security* 杂志,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本刊刊发前,作者对原文做了较大修改。

《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总第2期),第26—67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力转移的实用政治论调)。两派都认为中国的日益崛起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推而广之,也是亚太地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多大程度上奉行维持现状或者改变现状的外交政策。那些支持或反对中国所使用的最常见描述是,中国是一个心怀不满的改变现状国家,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台湾问题,想要将美国的军事力量从亚太地区排挤出去,想在权力分配方面用多极格局取代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这种描述方式通常是现实主义的见解,都是围绕崛起大国为何挑战现有制度、规则和权力分配格局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的。也就是说,这种论断往往符合现实主义观点中关于权力转移的内容,认为利益是不变的,建立大国势力范围的愿望是既定的,当中国的相对实力增强时,中国就有了更多挑战美国的机会。我认为,这种论断没有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使用的“维持现状”和“改变现状”这两个词的模糊性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仅如此,这种假设既没有深入剖析近二十年来中国外交政策中的维持现状的内容,也没有反思认为中国是改变现状国家的证据中所存在的问题。简而言之,我们还不能确定中国是改变现状国家还是维持现状国家。

一、21 世纪的改变现状国家是什么样的?

在过去 10 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的许多学者、评论家和决策者都把中国描绘成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国家。正如 1995 年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em Perry)在西雅图发表的演讲中所说,接触策略是促使中国更像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策略。^① 1997 年 3 月,前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伯杰(Samuel Berger)为已获连任的克林顿总统起草国家安全政策时,称中美之间的接触政策的目的在于拉着中国“朝国际社会的方向靠拢”^②。

^① 佩里于 1995 年 10 月 30 日在西雅图对华盛顿州的中国关系委员会所发表的演讲。可参见 William H. Perry, “U. S. Strategy: Engage China, Not Contain,” *Defense Issues*, Vol. 10, No. 109, <http://www.defenselink.mil/speeches/1995/s19951030-kaminski.html>.

^② Samuel Berger, “A Foreign Policy Agenda for the Second Term,”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 C., March 27, 1997, <http://www.whitehouse.gov/WH/EOP/NSC/html/speeches/032797speech.html>.

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领导的政府及其支持者也使用了类似的语言。前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曾用鲍威尔(Colin Powell)领导下的国务院那种较温和的现实主义语调说:“我们要看看中国怎样对我们做出回应。如果它违背大多数国家支持并遵守的国际准则,那将是令人遗憾的……我们鼓励中国做出能够反映它的国际社会地位和国际社会责任的选择。”^①在就任国家安全顾问前夕,赖斯(Condoleezza Rice)表示:“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②另外一些反映布什政府“美国优先论调”的人^③,则将崛起中国的与别的改变现状国(如军国主义的日本,特别是威廉德国)相提并论。^④

所有的这些描述显然围绕着一个相同主题:中国还没有或者只是刚开始成为“国际社会”中富有建设性的参与者;中国还没有完全认可全球行为准则。此外,崛起的、不满的中国对美国建立并推崇的国际秩序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至少有两个更基本的隐含假设支撑着这些对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描述:第一个假设认为,现有的国际社会已有了明确的界定,所以某国是否成为国际社会成员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第二个假设是,国际社会在人权、核不扩散、贸易等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准则和价值观。

但是,在21世纪初的国际关系中扮演维持现状或改变现状角色的国家是谁呢?尽管这两个词在国际关系理论和政界用语中占有中心地位,可是人们给

① James A. Kell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Washington, D. C., May 1, 2001,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01/index.cfm?docid=2697>.

②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0), p. 56.

③ 这一派最突出的人物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曾用“新帝国主义”一词来形容该派的观点。

④ 见 Robert Kagan, “What China Knows That We Don’t: The Case for a New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Weekly Standard*, January 20, 1997, p. 22; Paul Wolfowitz, “Bridging Centuries: Fin de Siecle All Over Again,” *National Interest*, 1997; Arthur N. Waldron, Professor of Strategy, Naval War College, “China as an Ascending Power,”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on Security Challenges, March 20, 1996。到了2002年末,才有一名布什政府官员驳斥这种描述。2002年12月,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sa)对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在大部分时间中都身处国际社会“之内”,因此把中国与帝国主义的德国进行类比是不合适的。然而,不能确定这是否代表了哈斯的一贯看法。见 <http://www.state.gov/s/p/rem/15687.html>。

它们下的定义不仅模糊,而且缺乏理论基础。^①

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说:“维持现状政策的目的是维持某个时期的权力分配状况。”^②维持现状政策是反对“对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转移,比如,将A从一等强家削弱为二等强家,然后将B提升到A过去所占据的显要位置”。“只要一些小规模调整不影响有关国家的相对权力地位,就完全符合维持现状政策的内容。”^③摩根索给出的定义几乎没有涉及以下问题:如何判定一个国家到底想要进行多大规模的“调整”?一等大国或二等大国究竟是什么国家?是否能依据这个国家的想法来预测其实际行为?

研究权力转移理论的学者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和亚切克·库格勒(Jack Kugler)给维持现状国家下的定义是:那些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并从这些规则中受益的国家。“挑战者”(如改变现状的国家)则是想在“国际社会中为自己谋取一个与自己实力相配的新位置”的国家。改变现状的国家对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普遍不满”。它们“想改写支配国际关系的规则”^④。不过,奥根斯基和库格勒并没有阐释支配国家间关系的到底是何种“规则”、这些规则是否得到普遍的接受以及如何知道这一点。还有,他们没有说清楚用何种指标来判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想在国际体系中谋取什么样的“位置”。

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对改变现状和维持现状国家的归类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变化。他的描述比早期一些古典现实主义的著作更细腻。他主要的定义是:“与它们目前所拥有的相比,改变现状的国家更珍惜它们渴望

① 比如,卡尔(E. H. Carr)的经典著作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London: Macmillan, 1940),至少有12处提及“维持现状国家”,但他并没对这个词下定义。

②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p. 46. 摩根索为检验一个国家是否奉行帝国主义(即改变现状)对外政策而设定了一项标准(第74页)。

③ 同上书,第46页。

④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9—20 and 23. 摩根索与奥根斯基和库格勒的定义有些不兼容。权力转移理论不仅从能力角度来界定维持现状的定义,而且也从意向的角度下定义。当一个崛起大国的相对实力在上升的时候,它是否想要改变规则?摩根索的定义只强调权力分配结构的变化(这可能是规则改变所导致的结果)。对摩根索来说,“崛起大国”本身的定义就包含了改变现状的倾向,即它们都想提高自己的实力来改变全球的权力分配结构。对奥根斯基和库格勒来说,当权力分配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只有那些想改变规则的国家才是改变现状国家。

得到的……它们将动用武力改变现状,并推广它们的价值观。”^①然而,除了分析特定时刻的权力等级结构以及威信(假设威信与权力等级是紧密相连的),他并没有明确指出维持现状所包含的其他内容。

在现实主义学者中,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对改变现状和维持现状倾向的探讨也许是最精确的。^②他将游戏规则分解为更便于操作的组成部分:权力分配、威信等级结构(现实主义者往往将之与权力紧密相连)和“支配或影响国家间交往的权利与规则”^③。因此,如果以这三个组成部分为依据,我们就可以合理地用以下问题来判定一个国家根本上奉行的是维持现状还是改变现状的政策。首先,国家领导人对一些具体的规则,比如国家间外交、安全机构和国际经济机构的规则,是怎样说和怎么做的?再次,国家领导人对全球或地区性的权力分配问题是怎样说和怎么做的?再次,他们对威信等级结构(这跟第一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是怎样说和怎么做的?对于吉尔平来说,改变现状国家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三个组成部分。如果不能确定国家在以上所有组成部分的意图,就难以把它们归类为改变现状或维持现状的国家。

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除吉尔平之外,很少有人考虑到从一个国家的整体对外政策偏好和行动来判定它是维持现状的国家还是改变现状的国家。^④可能正如詹姆斯·莫罗(James Morrow)所说的,纳粹德国是典型的改变现状国^⑤,因此,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的人往往认为

^①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 105. 按施韦勒的定义,倘若中国以经济发展的方式来增加它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那么它就不是一个改变现状的国家。

^② 不是所有的现实主义学者都采用维持现状和改变现状这种分类方法。根据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所有的大国都有改变现状倾向,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它们必然寻求权力的最大化以获取更多的安全感。见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p. 29.

^③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4.

^④ 见 Jay Lyall, "The Revisionist State: Definitions and Measures," Cornell University, 2001. 作者对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改变现状的描述所做的总结比我在此做的更为深入和细致。

^⑤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Why Write Them Dow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2000, p. 74. 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用纳粹德国来界定什么是“革命”(即改变现状)国家。他并没有真正提出一些能检验一个国家是否对现状不满的通用指标。但从这个例子(纳粹德国)推断,改变现状国家有一种极大的不满,而令它感到不满的因素包括自身微弱的权力和领土控制能力,在当时的全球经济中的经济损失、国际机构对它相对权力的约束,也许还包括它自己模糊地认为自己没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地位。见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57), pp. 1—2.

能一眼就识别出哪个国家是改变现状的国家。事实上,并不总是这样易于识别的。因此,我们需要更多有助于识别改变现状和维持现状外交的精确指标。以下我将提供论据来证明,即使根据原先的设计和应用的指标,认为“崛起大国即是改变现状的国家”的传统推论,也是无法解释中国整体外交行为的。

下面我提出一套指标供参考,通过它们可以判断某个国家是否游离在维持现状的“国际社会”之外。我制定了5个这样的指标,并把它们分为两组。排列顺序是从对现状最不具挑战性到最具挑战性的指标。第一组指标检验的是,一个国家具有多大的主动性去挑战国际体系中受大多数国家支持的重要国际组织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在这里,我借用了吉尔平关于“游戏规则”的理论。

1. 该国家很少参与那些制约国际社会成员行为的国际机构。用最简单的表达方式说,非维持现状国家可以参与,但却没有参与那些旨在帮助构筑并协调国际社会成员关系的国际机构。

2. 该国家可能参与了这些国际机构,但没有接受国际社会的规范。一旦它成为这些机构的成员,就会违反这些规则和规范。^①

3. 该国家可能参与了这些机构并暂时遵守它们的规则和规范,但如果有机会,它会想方设法改变这些规则和规范,使之与建立这些机构的最初目的背道而驰。

第二组指标检验的是一个国家对看似不利于自己的权力分配格局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

4. 该国对国际体系中的物质权力分配进行彻底的再分配的偏好。

5. 该国行为的目的基本在于实现这种权力再分配,因此,军事力量被看作一个重要的手段。

以下,我将依据这5项指标对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外交进行评估。

^① 这个指标假设这些规范和规则都是不可质疑的。稍后,我将证明一种分析上的困难,即在一些情况下,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国际社会准则可遵守。这不会破坏我们试图估计一个国家的政策倾向于维持现状程度的努力,但却会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复杂。

二、对国际机构的参与率

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对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参与率显著上升。图-1 是中国、一些工业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外交上非常积极主动的印度)在同一时期参与跨地区政府间组织的数量情况。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中国从远离变为走进国际组织,加入的国际组织达到了图-1 对比国参加数量的 80%。^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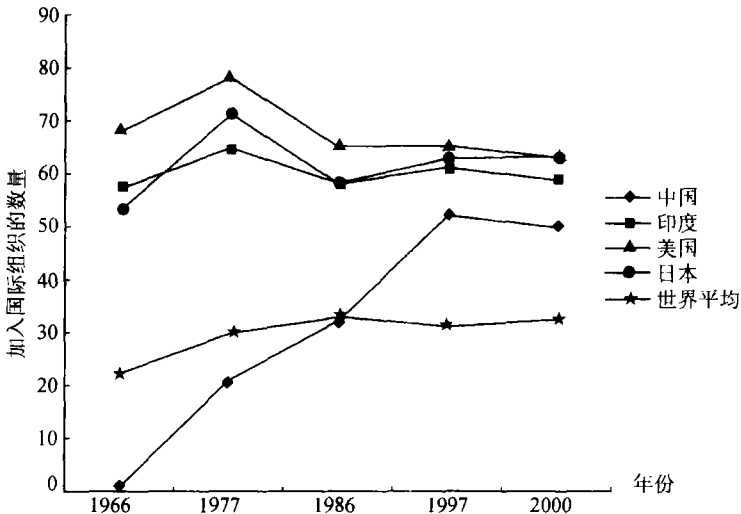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与其他国家参与国际组织数量的对比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38th ed. (Brussels: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2000/2001)。

^① 在 1971 年之前,中国游离于联合国之外,因此我们比较难对中国在此之前的参与率进行编码。就是说,尽管中国想参与多个国际组织,但由于它坚持这些组织必须先把中华民国驱逐出去,因此它无法加入。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由于中国领导人做了政策上的抉择,因此中国在 1971 年之前的低参与率应该按有意识的政策抉择来进行编码。我要感谢阿尔·威尔勒(Al Willner)提出这一点。中国参与国际国家间组织的规律和它加入条约的规律相同。比如,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加入了 10%—20% 它有资格加入的国际军控条约。至 90 年代中期,它已加入 80% 的此类条约。这些数据捕捉了中国领导人对参与国际组织的愿望。

图-2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中国参与率的变化。本文使用国家发展水平来预测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对国际组织的参与率。所设的假定是:资源局限较大并且与全球经济联系较少的国家较少参加国际机构。发展水平的高低与相互依赖程度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对能够协调国际交往的机构的需求很大。因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充当对国际制度需求的指标。^① 图-2 显示: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中国的参与率低于回归曲线,即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太少了,与当时的发展水平不相称。而到了 90 年代,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程度则超过了它的发展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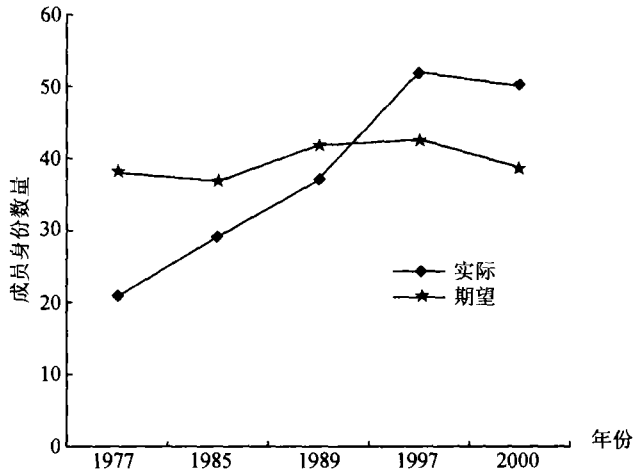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实际与预测数量

(以人均 GDP 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来预测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

三、遵守国际准则的程度

国际机构的参与率上升不一定是维持现状做法的精确指标。有些人可能会说,更重要的是遵守这些机构的规则、准则和目标。因此,一个参与这些机构

^① 对那些拥有两组数据的国家,我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预测每个国家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按图-2 显示的年份,我把这些数据输入序数最小方差回归方程。结果是 R^2 分布在 0.16 至 0.23 之间,并且它们的统计显著性都小于 0.01。

但违反其规定并违背自己所做承诺(而且是故意违反,并非因能力不足而不得不违反)的国家仍不被认为是维持现状国。有时,判定什么是国际准则是相当简单的;但有时,这种判断则显得较为困难,从而使得遵守规则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下面,我将列举中国对五大国际规则体系(即主权、自由贸易、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民族自决权以及人权)的遵守情况。

(一) 主权

外交中最深入人心的基本准则可能就是主权原则。它界定了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体的性质、大多数国际机构的核心特征(包括其成员的资格条件和决策程序),以及这些主要行为体所采取的重大外交行为。从历史上看,主权的意义依条件而定。中国如今是坚决捍卫较为传统和绝对主权概念的国家之一。它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一起强调主权和内部自治,抵制诸如人权和人道主义干预等新兴概念所构成的挑战。^①

(二) 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可能是主权之外现阶段各国政府争论最少的一个国际准则。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一直在总体上对全球自由贸易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不过,由于计划经济残余和经济利益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在遵守并履行这些标准时显得困难重重。具体来说,中国的平均税率从1992年的40%以上降至1997年的不足20%(见图-3)。根据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做的承诺,税率还要进一步下调(在2004至2005年期间,工业品平均税率降至9.4%,农产品平均税率降至14.5%)。迄今为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行为最明确地表明了中国对现有自由贸易体系的支持。毫无疑问,中国也有违反规则的情况,但并没有摆脱国际社会的监督。中国可能会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中存在的诸多漏洞,在必要情况下保护其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领域。不过,这与美国单方面使用反倾销规则保护自己重要经济领域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许

^① 见 Allen Carlson, *Constructing a New Great Wall: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orm of State Sovereignty*,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0。有意思的是,在布什政府强调主权为中心的保守势力的影响下,美国和中国在维护传统主权概念上的政策比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时间的政策更为一致。

多专家还认为,中国在遵守规则上的首要问题并非无视政府对世贸组织所做的承诺,而是由于难以控制地区经济利益集团而不得不做出让步。^① 因此,最近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中国在履行入世要求方面表现出了“诚意”^②。美国总审计局最近公布,中国在构筑符合世贸组织要求的国内基本法律体系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决心”^③。国务卿鲍威尔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敌人”^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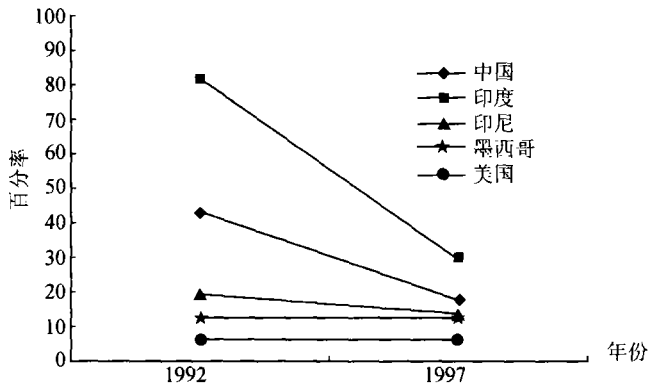


图-3 平均关税率减少的比较(1992—1997)

资料来源:World Bank Indicators, 1998, CD-ROM, Table 6.7。

注:在世界银行的数据表中,有些国家的数据年份不相同,如墨西哥的数据是1991和1997年的,印尼的数据是1993和1996年的,印度的数据则是1990和1997年的。

① 比如,见2002年6月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克拉克(Donald C. Clarke)在国会中国执行委员会的证词, [http://www.cecc.gov/pages/hearings/060602/clarke Testimony. pdf](http://www.cecc.gov/pages/hearings/060602/clarke%20Testimony.pdf)。

② 见2002年6月美国副贸易代表亨斯曼(Jon M. Huntsman Jr.)在国会中国执行委员会的证词, <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uschina/huntsman.htm>。

③ 见2002年6月美国总审计局国际事务和贸易执行主任韦斯汀(Susan S. Westin)在国会中国执行委员会的证词, [http://www.cecc.gov/pages/hearings/060602/westin Testimony. pdf](http://www.cecc.gov/pages/hearings/060602/westin%20Testimony.pdf)。如参阅全文,见GA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Observations on China's Rule of Law Reforms*, GAO-02-812T (Washington, D. C.: GAO, June 6, 2002)。

④ 2002年6月10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在纽约亚洲协会年度会议晚宴上的讲话,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2/10983.htm>。

(三) 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

在这个问题上,判断中国的表现需要区分以下5种行为:(1)违反正式签署的多边条约的行为;(2)违反单边或双边政策声明但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比如,中国在2000年11月承诺不帮助他国开发导弹技术控制规则所禁止的导弹);(3)不违反中国的政策声明或国际法的行为(比如,向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范围内的地点转让核技术);(4)违反了条约规定但表现出与美国有共同利益的行为(比如,反对《渥太华禁雷公约》,该公约要求禁止使用、生产和转让具有人员杀伤性的地雷);(5)中国和一大批国家共同反对并孤立美国的行为(比如,中国反对布什政府2001年12月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决定)。

第一和第四种做法显然是对明确的国际准则发出的最明显的挑战。第二和第三种做法尽管可能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挑战,但是对“游戏规则”的违反情况不太明显。第五种做法不能被视为对国际规则体系的违反。

在关于军备控制的许多问题上,中国的表现很难衡量。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问题上,中国不是惟一个向与美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国家转让技术的国家(经常是没有正式受到限制的技术)、事实上,向这些国家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外国供货方包括了一批公认的维持现状国家。^① 在中国同意遵守1987年签署的《导弹技术控制规则》,并于1996年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后,美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的表现有了改善,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问题。克林顿总统时期负责核不扩散问题的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罗伯特·艾因霍恩(Robert Einhorn)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在核出口问题上的表现有了极大的改善。不过在与导弹相关的出口问题上,它的表现至多是好坏参半。”^②

① 截至1998年,给伊朗提供核相关技术的公司来自阿根廷、比利时、英国、中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瑞士和美国。可参见 Andrew Koch and Jeanette Wolf, *Appendix: Selected Iranian Nuclear Imports* (Monterey, Calif.: Monterey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8), <http://cns.mii.edu/pubs/reports/pdfs/irantbl.pdf>。应该指出,中国政府如果能把握好规范偏好和预算项目的轻重,它是有能力禁止这些出口的。与此对比,西方国家所面对的供货商多数都是比较难监察的私人企业。

② Robert Einhorn, "Proliferation Challenges in Asia," comments 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Asia Security Conference, Singapore, May 31-June 2, 2002.

布什政府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中国“不像过去那样大力推销和扩散武器”,但它仍没有按《导弹技术控制规则》办事。^①

仍然让美国担心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有权利合法转让军民双重用途技术,这种转让可能没有履行中国对美国做出的承诺,但也未违反正式的多边条约。更多的情况是,中国签署了一系列具有潜在约束力的军备控制协议。《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它限制了中国实现核弹头现代化设计的能力。不过,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中国违反了承诺。

在常规武器转让方面,没有多少准则可供各国打破。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明确的国际行为标准可用来衡量中国的表现。已有的规则体系并不具有很大的约束力。中国和美国一样,反对《渥太华禁雷公约》和那些试图更加严格控制小型武器交易的努力。总体来说,虽然中国仍是一个重要的武器出口国,但它已经失去了20世纪90年代所拥有的大部分武器市场,因为这些国家转向购买苏联质优价廉的武器,或者从美国和西欧的供应商那里购买武器。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并非因为国际准则而自觉抵制武器转让,减少武器转让是因为失去了市场份额。

(四) 民族自决权

外界习以为常地批评中国违反了这一准则,不管是对西藏的藏族人还是对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或者是对台湾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虽然很多人不满中国对待少数民族的方式以及中国拒绝允许台湾和平“独立”,但如果指责中国违反了民族自决权这一国际准则,这就是对该准则的曲解。国际惯例和国际法虽然往往不够明确,而且在不断地演变发展,但它并不承认哪个社会、政治或民族组织有绝对的独立自主权。各国都担心无条件支持民族自决权的规定。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关于非殖民化和民族解放的文件非常清楚:它们承认受压迫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不过不一定是通过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

^① Jane Perlez, “Chinese Firm Is Punished by the U. S. for Arms Sal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2001, sec. 1, p. 9.

国家的方式),但是它们也试图保护新独立的非殖民化的国家免遭进一步的分割。^①也就是说,自决权通常只针对于那些受到外来统治压迫(比如殖民主义)和那些没有多少,甚至根本没有机会统治自身的民族。^②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不承认少数民族拥有自治或分离出去的权利。总体来说,关于自决权的国际准则旨在保护现有的主权国家,尽管有些个人希望看到某个民族获得正式的独立。

其次,美国针对具体的民族自决权事件所采取的外交政策也是模棱两可的。例如,美国不支持魁北克独立,尽管当地绝大多数讲法语的人曾在20世纪90年代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表示支持某种形式的独立。1999年,美国出面干预,反对塞族人镇压科索沃人,但它并没有支持科索沃的独立。其实,美国起初并不支持南斯拉夫解体。美国显然也没有正式承认本国土著人或俄国的车臣人,甚至还有中国的西藏人的民族自决权和建立主权国家的权利。

(五) 人权

和其他任何重大国际准则相比,人权准则也许可以表明将中国视为维持现状国家的困难。某些自由民主团体和非政府人权组织往往提出中国违反人权的事件。不过,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国际社会”是如何阐释人权规则体系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方法是看看大多数国家对中国人权方面的做法持何种立场。这里的问题是,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这个对各国人权状况进行监督的重要国际论坛上,从1992年到2001年,中国都成功说服了一批国家投票反对通

^① 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自决权是有条件性的规范的讨论,可参见 Michael Freeman,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Peace, and Human Rights," *Peace Review*, Vol. 10, No. 2, 1998, pp. 157—163; rapporteur's report on the Competing Claims: Self-Determination, Security,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Denver, November 29-December 1, 2000, http://www.ipacademy.org/Publications/Reports/Research/PublRepo ReseCompClaims_body.htm。还可参见 *Declaration on the Granting of Independence to Colonial Countries and Peoples*, G. A. res. 1514 (XV), 15 U. N. GAOR Supp. (No. 16) at 66, U. N. Doc. A/4684 (1961)。这份文件把自决权放在反殖民主义中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让那些由于种族、信仰和民族等因素而遭受制度性歧视的人们实现自决。可参见 Valerie Epps,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China/Taiwan Context," *New England Law Review*, Vol. 32, No. 3 (Spring 1998), <http://www.nesl.edu/law-rev/vol32-3/epps.htm>。

^② 见 Bryon N. Tzou, "Does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Apply to Taiwan?" *Issues and Studies*, Vol. 28, No. 6 (June 1992), pp. 70—85。作者分析了把有关自决的国际规范套用在台湾问题上所产生的问题。

过批评中国人权的决议(见图4)。从简单过半数原则来看,中国应该是属于“国际社会”,并且遵守其人权规则体系的。不过,如果以国际体系中大多数国家自己的做法为标准,中国可能不在“国际社会”范围之内。不过,这也很难说。因为在国际体系中,只有一半多一点的国家是民主国家,而剩下的国家中相对多的是专制或独裁国家。^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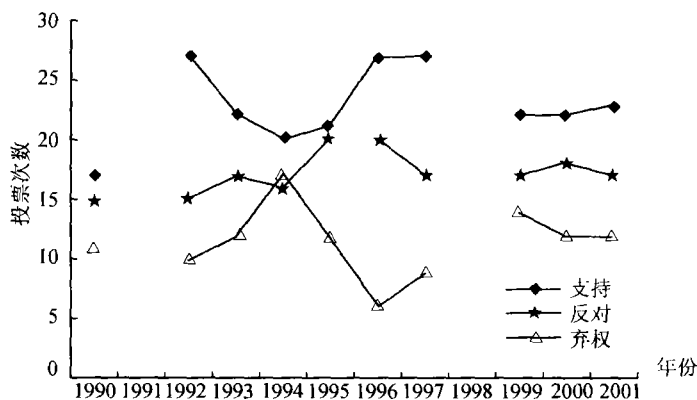


图4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取消批评中国的决议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意味着反对批评中国)

资料来源: Anne Ken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Human Right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9), pp. 60—79; 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ports, E/1993/23, E/1994/24, E/1995/23, E/1996/23, E/1997/23, E/1999/23, E/2000/23 and E/CN.4/2001/L.10/Add.9。

注: 1991和1998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没有提出批评中国的决议。

其次,国际人权规则体系的内容是什么?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根据国际人权规则体系方面可能最全面、最具权威性的共识(1993年发表的《维也纳会议宣言》),“国际社会”一方面承认个人在政治和公民自由方面享有平等地位,另一方面也承认集体的社会和经济权利(包括发展的权利)。从这一点看,

^① 在1999年,有55%的国家在衡量民主制度总水平的政体IV指数上获得5级或更高的等级。在同样的指数上,有64%的国家获得1级或更高的等级。该指数的数值从-10(独裁体制)到10(民主体制)。

当美国用政治和公民自由的标准衡量中国的行为以及中国强调集体的社会和经济权利以做回应时,双方可能都歪曲了“国际社会”的标准。的确,在中国,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有不执行或违反中国宪法和中国已签署的人权协议中的政治和法律权利的现象。但问题是,中国在保护中国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权利方面是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经济发展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当然,社会经济权利的提高不是这样明显。这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这需要判断社会经济发展(主要出现在中国城市)是否表明全体中国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权利改善,以及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环境的恶化、平等教育与福利医疗体系的缺乏(主要指中国农村)是否表明中国人的社会和经济权利恶化。中国政府对其人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保护是每况愈下,还是不断改进,这取决于我们把中国看成是搞福利制度的国家还是促进市场经济的国家。

总体来说,在一系列关于国际准则的问题上,中国似乎比过去更遵守现存的国际社会准则。但是,这种讨论也突出了在评估中国多大程度上遵守或挑战国际准则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些准则本身经常是自相矛盾的。那种认为国际准则是逻辑连贯的并得到国际社会一致支持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准则往往相互冲突,比如主权准则与自由贸易准则或政治权利准则之间就有矛盾。

四、在“游戏规则”方面的做法

衡量一个国家对国际现状所持态度的另一个指标是,看它是否试图积极地改变规则,让国际机构的目的落空。换句话说,看它是否想破坏所谓的“游戏规则”。这很难衡量,因为“游戏规则”这个词既出现在现实主义理论中也出现在有关中国的政策讨论中,但它的含义非常模糊。通常,当学者、决策者或评论员使用这个词时,它所暗含的标准是:这个国家是用美国所欣赏的方式行事吗?显然,这并不是社会科学的科学标准。

不过,要赋予“游戏规则”这个词更多实质内容,可能需要问两个问题:首先,这个国家试图改变它所加入的重要国际组织中的正式或非正式运作规则吗?其次,这个国家通常会在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反对维持现状国家的利益吗?

说到中国,一个衡量指标是,它向自己所在的国际机构提议的规则与它不得不接受的规则之间有什么差别。这个差别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如果“游戏规则”主要由中国制定,它们会是什么样子。

至少在国际经济机构中,中国提出的新规则非常少。这可能主要因为中国是在大部分经济机构成立后才成为它们的成员,也因为这些规则通常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比如,关于从世界银行征集资金的规则)。此外,大多数学术观察家对中国一旦加入这些机构后对它们现有规则的遵守情况持肯定态度。关于中国参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状况最为权威的研究都表明,中国表现得相当不错。中国政府一方面会满足这些机构的要求,同时也不会设法让它们的决策方式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改变。^① 在世界贸易组织内,中国基本接受了该组织的全部决策程序和体制,而且小心翼翼地其中发挥领导作用。^②

在安全机构方面,情况不是这样清楚,部分原因是中国参与组建了其中一些较为重要的安全机构。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来说,如果中国能将自己在谈判中的一些立场带入该条约中,那么它就不那么“爱管闲事”,对签字国遵守条约情况的监督也不那么严格。此外,如果各国可以实施“和平的核爆炸”,这将严重破坏该条约在禁止核武器试验方面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一旦中国的谈判立场占据上风,那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就会遵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如果这一点可以得到实现(比如通过将核弹头暂交第三方保管的办法)^③,那么由多个国家做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将减少依赖核武器来保障安全的动机。虽然按照中国想法设计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实地核查方面

^① 见 Margaret M. Pearson,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egime,”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9), pp. 161—205; Nicholas Lardy,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in *ibid.*, pp. 206—230.

^② 玛格丽特·皮尔逊(Margaret M. Pearson)对中国在世贸组织的表现做了开拓性的研究。皮尔逊对参加世贸会议的各国代表团进行了详尽的访谈。见 Pearson, “Multiple Personalities in Geneva: Constructing a Template for Future Research on Chinese Behavior in WTO,” paper presented at 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onference in Honor of Allen S. Whit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ovember 8—9, 2002.

^③ 将核弹头暂交第三方保管的做法需要把弹头存在离运载工具数百英里内的范围,而这将导致为首先攻击所做的准备很容易被人察觉。可参见 Stanfield Turner, “The Case for Strategic Escrow,”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Vol. 54, No. 2, 1998, <http://www.thebulletin.org/issues/1998/ma98/ma98turner.html>.

可能比较薄弱,但它会具有造价昂贵而且覆盖面极广的卫星监督能力。这将给条约增加早期预警的能力。目前,监督系统只能在违反条约的事实发生后再去核实。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支持中国所提出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中的国际卫星监督原则,但对其高昂的造价表示反对。¹

最后一点,即便有证据表明中国强烈倾向于大刀阔斧地重新制定当前的国际经济和安全制度,也不能说明改变制度是容易的。一些学者表示,改变“游戏规则”意味着改变机构的准则或意识形态。但是大多数机构的规则都有相应的规则管理;通常规定了改变这些准则、意识形态和机构的宗旨要经过何种程序。要分析中国是否能改变这些规则,需要对这些程序有深刻的了解。不足为奇的是,在许多机构中,这些程序往往是极端保守的。这些程序就是为了防止那些具有改变倾向性的成员国或具有不同倾向性的新成员国轻易改变机构的宗旨。如果机构本身发展比较完善,就会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组织利益及使命感,它会制定决策规则,防止权力被削弱或冲淡。有些机构,比如世界贸易组织,需要获得绝大多数甚至全体成员国的一致通过才能做出改变,要改变这样的机构是极其困难的。心怀不满的成员国不得不联合绝大多数国家,甚至要想方设法不让任何一个成员国投否决票。²

至于第二个问题,证明中国反对维持现状国利益的证据极其复杂。理想的做法是,列出中国在各种国际论坛上追求的--长串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但是一个快速的检验指标是看它在联合国大会上与他国的投票一致性。³ 不足

1. 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各方谈判立场的分析,可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he Social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n Domestic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Daniel W. Drezner, ed., *Locating the Proper Authorities: The Interac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p. 176—187.

2. 关于决策规则如何保护一个机构的意识形态的讨论,可参见 Gregory W. Downs, David M. Rocke, and Peter N. Barsoom, "Managing the Evolution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52, No. 2, 1998, pp. 397—419.

3. 在此,我用了 Curtis S. Signorino 和 Jeffery M. Ritter 所设制的相似度指数。S 指数基本上是一个可以在一个或多个政策方面衡量 A 国家与 B 国家之间距离的空间模型。在唱名表决中,与传统使用的 tau B 比较,这个指数能更准确地衡量趋同性。见 Signorino and Ritter, "Tau-b or Not Tau-b: Measuring the Similarity of Foreign Policy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1 (March 1999), pp. 115—144。我要感谢 Erik Gartzke 为我提供了他的相似度(亲和度)指数数据组。第一个时间段(1974—1978)从数据的初始值开始,到毛泽东时代结束;第二个时间段从 1979 年到 1988 年;第三个时间段从 1989 年到 1996 年。

为奇,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中国与诸如印度和墨西哥之类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似度指数(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两个国家之间政治距离的指数)相当高(见图-5)。中国与维持现状的发达国家(比如英国、加拿大和日本)之间的相似度指数比较低,不过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与加拿大和日本之间的相似度指数有所提高。到目前为止,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相似度指数最低,而且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指数还在继续下降。因此,尽管美国和中国的利益摩擦加大(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但这并不是中国与其他维持现状国家之间关系的普遍状况。图-5 表明,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采取维持现状的做法,而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本国利益的界定导致两国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在判定中国对国际准则和机构的不满程度有多大时,应该把这两个问题区分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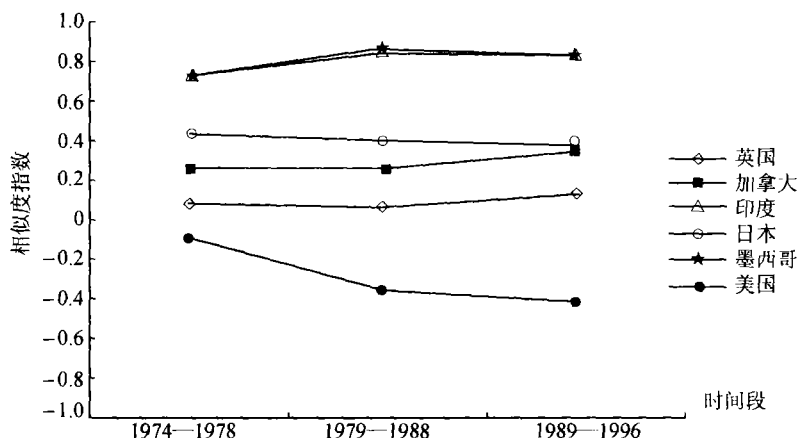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与特定国家在几个对外政策时间段的相似度指数的比较 (1974—1996)

五、改变现状的倾向和权力分配

对于衡量国家改变现状倾向性的第四个指标,美国许多学者和政策分析家的普遍看法似乎是,中国显而易见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地区霸权,而且随着相

对实力增强,中国将有能力做到这一点。^①他们提出,中央帝国以中国为中心,抱有建立现代版的传统“朝贡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小国乖乖服从中国)的愿望。或者,根据更笼统的历史类比,中国就像过去的德国和日本一样希望改变亚洲的权力和地位等级,并最终结束美国的单极地位,以一个多极世界取而代之。

这种声称中国打算改变地区和全球权力分配的说法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个而且也可能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领导层是否会经过深思熟虑后一致倾向于建立地区霸权、把美国的军事力量排挤出这一地区,并恢复过去的朝贡制度,或者用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说法,建立一种类似于冷战期间苏联在东欧或者美国在拉丁美洲建立的势力范围。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是否真的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制衡美国的军事力量,并试图破坏它的同盟。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很难。如果要列举一些人所认为的中国领导人在东亚地区改变现状的目标,那它们将包括:破坏美国的权力,建立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霸权;维护对中国明确声称拥有主权的领土(例如南海岛屿)的控制权;在一个中国原则的指导下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然而,这些改变现状的政治军事目标越雄心勃勃,它们作为证据就越不清楚。最好的证据就是中国领导层希望最终改变台湾问题的现状。现有的大量政府文件和声明、思想库的研究和访谈资料表明:中国领导层只是希望阻止台湾进一步朝着最终分离的方向发展。同时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训练演习和人民解放军的理论更新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对付台湾分裂,尤其是在1996年的台海危机之后。^②

^① 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报告(*Report to Congress Pursuant to the FY2000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该报告指出:中国想通过增加足够的力量成为亚洲的超级大国,到时候,任何其他亚洲地区的国际主体在进行重大行动前,都必须先考虑中国的利益……中国想要成为东亚地区国家中的超级大国。见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Jun2000/china06222000.htm>。许多人把这个观点视为公理。可参见 Aaron L. Friedberg,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Commentary*, Vol. 110, No. 4, 2000, p. 17; Larry Wortzel, *China's Military Potential*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rmy War College, October 1998), p. 16。

^② 关于防止“台独”的重要性,可参见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in Richard J. Ellings and Aaron L. Friedberg, eds., *Strategic Asia: Power and Purpose, 2001—2002* (Seattle, Wash.: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1), pp. 39—47; David M. Finkelstein, *China's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Alexandria, Va.: CNA Corporation, January 2000), pp. 5—6。

在南海岛屿问题上的证据则更不可靠。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过去5年内的外交姿态比20世纪90年代初缓和了不少,中国正尝试着接受东南亚国家同盟提出的一套行为准则。然而,与政府有关的一些思想库的内部传阅材料确实表明,中国的长期目标仍然是维护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一些中国分析家认为,中国具备了军事实力,就应着手去做;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应当通过外交磋商、共同经济开发和国际法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军事手段的代价太大了。^①其实,中国与其他声称对南海岛屿拥有主权的国家的政策是一样的。目前,没有一个有坚实的法律基础能支持这些国家的主权声明,无论它们的理由是首先发现、占领和定居,还是大陆架的延伸、群岛原则或者专属经济区的延伸。

有关在东亚及以外的地区建立中国霸权的证据是最值得怀疑的。大多数提出这种说法的学者、政府官员和专家是从对中国特定阶段的历史进行特殊的解读之后得出此结论的。一些人援引古老的中央帝国,或者更近一点的清朝的朝贡制度为例,并将此作为证明现代中国领导层想法的不容置疑的证据。还有的人得出的结论是基于与欧洲进行的历史类比(最普遍的就是威廉德国的崛起)。历史类比只是类比,不能作为理论依据或者解释说明。这种类比论据一般只挑选相同点研究,而忽略重大的不同点。利用历史类比解释目前中国领导层意图的人一般会犯两种分析错误中的一种:要么他们无法解释清楚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只吸收某些历史相似性(例如中国的朝贡制度或者某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帝国制度)而不是另外的一些相似性;要么就是无力说明中国当今的外交政策倾向为什么与中国或欧洲早期领导人的倾向一样,而这种倾向为什么不被显然更新的、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所腐蚀、改变。例如,为什么威廉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目前中国领导层在台湾问题上的高压外交之间的相似性不能被如下事实所改变,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比威廉德国更依赖外国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并获得政治上的合法地位。或者,为什么这些相似性不会受到下面事实的影响,即21世纪早期不像20世纪早期那样,

^① 有一项研究这么说,中国的“搁置分歧和共同发展”的政策是一种“战略,不是目标”。见刘建仁:《南沙争端及对策》,《南沙问题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1996年,第311页。认为外交手段比武力手段更好的观点,可参见张植荣、吴冲:《解决南沙争端的对策选择》,同上书,第267页。有加拿大外交官指出,中国外交部的地区安全专家私底下承认东盟地区论坛的存在以及中国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多边关系,已降低了中国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的可能性(我与参加1998年10月举行的地区安全对话的加拿大外交官所做的访谈。)

获得新殖民地已不再是大国地位的象征。又或者,为什么这种相似性不因下面的事实所改变,即中国的相对实力与倾向于维持现状的美国实力的差距远不能与德国的相对实力与倾向于维持现状的英国之间的差距相比。^①

然而,与其他两个改变现状目标相比,这些在类比基础上提出的有关中国长期目标的结论存在的问题是,很难理解一大堆文献记载中证据的意义。有关中国意图的这些结论引用的一条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中国领导层声称,随着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美国的相对实力正在减弱,而这对中国是一件好事。有关多极化是一个客观趋势而且是一件好事的声明,明显对美国继续维持其霸权或者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当然,需要对这一说法的意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即使那些主张采取接触政策的美国学者也认为,中国领导层对多极世界的偏爱,表明他们的愿望与美国领导人维持美国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的优势在根本上是冲突的。^②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中国有关多极化的说法呢?这个说法事实上早已有之。这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他说,除了两个超级大国,还有一个第二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或者叫革命世界(发展中国家),而且第二和第三世界越强大,两个超级大国越受限制。^③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声称,世界正朝着多极化发展,朝着一个由5个权力均衡的中心(中国、欧洲、日本、俄罗斯和美国)构成的更稳定的世界发展。^④ 这不仅是一个描述性的也是一个规范性的说法。然而,让人不明白的是,人们能

① Avery Goldstein, "The Diplomatic Face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Power's Emerging Choice," *China Quarterly*, Vol. 168, 2001, p. 862. 这是对以上的描述,以及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所做的其他比喻的精辟批判。

② Evan A. Feigenbaum, "China's Challenge to Pax,"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4, No. 3 (Summer 2001), pp. 31—43; David Shambaugh,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From Partners to Competitors," *Survival*, Vol. 42, No. 1, 2000, pp. 97—115; and Bates Gill, "Contrasting Vision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Order," remarks to the U. S. -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 C., August 3, 2001, <http://www.uscc.gov/tesgil.htm>.

③ 中国著名国际关系专家王缉思追溯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美苏“中间地带”的概念。见 Wang Jisi, "Multipolarity versus Hegemonism: Chinese View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da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lict or Convergence: Global Perspectives on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conference, Harvard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ovember 13—15, 1997, p. 1.

④ 见 Michael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61。此书详尽描述了这一讨论。

从这种多极化的论述中推断出有关中国战略目标的什么结论？

首先,多极化的观点在中国的外交政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模糊的。中国对国际关系大趋势(国际格局)的评论通常都带有一股赶时髦的味道。多极化的论述是否会左右领导层的决定,反映领导层的偏好,或者是否表明一种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所怀有的深深的、与生俱来的受害者情结,这都不清楚。例如,中国领导人一直钟情于抽象的多极化,因为抽象的多极化含义是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减小,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相对加强。但是,就像托马斯·克里斯滕森(Thomas Christensen)指出的那样,如果有人问中国的战略家,支持多极化是否意味着支持日本的相对实力和战略独立性增强或者支持印度发展核武器,他们的回答通常都是否定的,或者至少是模棱两可的。^①

其次,多极化趋势意味着什么,这在中国也颇有争议。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最典型的官方说法是,国际格局表现出从冷战的两极化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然而,这种说法没有说明,目前的过渡阶段是否为实际上的单极世界,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②例如,一些强硬民族主义者不认同官方的说法,他们认为世界实际上是单极的。这意味着中国短期内在挑战美国的权力方面必须小心谨慎,但长期目标应该是通过建立战略和外交同盟来做到这一点。^③一些温和派的人士也认为,目前这一时期基本上是美国的单极世界^④,但是,这也并非完

① 见 Christensen, "China," p. 30。一位著名的保守派中国战略家及最早倡导多极化的主要人物,指出他个人支持一个反日的美中同盟。这个立场与日本应该成为多极世界的一极的说法有相当大的矛盾。这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们一个启发,当我们研究中国意向的时候要注意一个重要环节,即我们必须跟访谈对象讨论真实世界的多种情况,以及他们认为自己在这些情况下做出什么样的抉择。

② 见王缉思:《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页。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倾向于把国际关系中所有时代都视为“过渡时期”,但又不解释这些过渡期的内容包括什么。对此,他做了隐晦的但又是彻底的批判。

③ 何新:《关于当前国内形势的一封信》(1992年5月4日),何新主编:《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75页;房宁、王小东、宋强:《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还可以参见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第28页。意料之中的是,那些倾向于对美国奉行积极制衡战略的人,对中国越来越依赖全球资本和市场感到忧虑。因此,他们批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不过,由于加入世贸组织已是中国的政策,这意味着主张奉行制衡战略的强硬派目前在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不占主导地位。

④ 比如,可参见张蕴岭对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的稳定性的分析,张蕴岭主编:《伙伴还是对手:调整中的中美日俄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0页。他暗示道,把当今国际体系描述为“一超多强”是对美国单极世界的一种政治上比较正确的说法,但这“多强”当中有些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因此这也是美国权力的一部分(第30页)。

全对中国不利。例如,美国霸权就比日本霸权好。^①此外,尽管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但中国可以从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和美国霸权提供的相对稳定中获得好处。就像一位分析家所说的那样,尽管中国不希望国际体系被美国和西方制定的规则所掌控,但中国认为可以搭便车,并从中获得一定好处。^②另一位分析家认为,尽管中国支持一个更公正、更合理的国际秩序,但“中国绝不是目前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因为在目前的国际体系和规则下,中国可以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③尽管如此,还有一位分析家说,中国既不是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也不是盲目追随者。相反,中国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帮助建立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上,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协调。^④如果让这些温和派分析家提供政策建议,那就是中国应当利用国际机构(多边主义)而不是军事力量来限制美国的行为。^⑤

另一方面,其他一些温和派的分析家仍然声称,多极化还是主要趋势。但是,他们提出这种说法是为了阻止中国的强硬派,因为强硬人士认为在单极世界里需要更加积极地制衡美国。因此,对于这些温和派来说,多极意味着中国不需要那么积极地对抗和挑战美国的利益。^⑥美国的一些分析家却误解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多极化的观点证明中国一致希望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⑦对于那些立场更中立、主张实用政治的人来说,多极化基本上意味着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根本不是革命性的或者改变现状的价值观)基础上的国际体

① 王建伟对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精英态度的研究,见 Wang Jianwei, *Limited Adversaries: Post-Cold War U. S. -China Mutual Ima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王逸舟:《关于多极化的若干思考》,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所,2000年4—5月。

③ 朱锋:《在历史回忆中把握中美关系》,《环球时报》2002年2月28日, <http://interforum.xilubbs.com/>。

④ 范晓军:《参与和培育国际关系的制度建设》,《国际关系学院学报》(深圳)2002年第2期。

⑤ 见张蕴岭:《综合安全观及对我国安全的思考》,《当代亚太》2000年第1期,第1—16页;王逸舟:《多极化不等于反美》, <http://memo.363.net/comment/duice09.htm>;王逸舟:《新世纪的中国与多边外交》,提交给“多边主义理论与多边外交研究会议”的论文,北京,2001年7月。张蕴岭指出,对美国权力的最主要限制力量是市场和国际机构。见张蕴岭:《伙伴还是对手:调整中的中美日俄关系》,第31页。

⑥ 比如,可参见王小东对时殷弘的批评,见王小东:《美国炸中国驻南使馆后的一些思考》;房宁、王小东、宋强:《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第3—20页。

⑦ 见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 S. -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July 2002, http://www.uscc.gov/an_rp02.htm。

系,在这种体系下,其他国家要把中国的重要利益考虑在内。^①

整体上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分析家对于多极化发展过程中的趋势,或者多极化是否暗示中国应当对美国的势力发起挑战的看法并不一致。^②而且,自从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美国成功地在科索沃部署力量后,随着美国和潜在竞争对手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越来越大,许多中国分析家对多极化是否正朝着中国领导层希望的方向发展感到越来越悲观。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似乎开始采取回避的做法,它声称多极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但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体系的特点将是一超多强。^③在这方面最有意思的是2000年的国防白皮书,这份报告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家们编撰的。在报告的前言中,作者认为美国的相对实力(美国与所有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即便没有增长,也是一直保持未变。对中国的综合国力(一个综合指数,它通过衡量硬实力即国家整体力量、军事力量和教育水平等,和软实力即外交政策影响和文化推动力等指标决定一些主要国家未来10—20年内的相对实力)的评估,让人越来越怀疑中国缩小与美国之间差距的能力。图-6显示了中国对其综合国力占美国综合国力百分比的变化趋势的估计(1990—2020),让人们感到越来越悲观。^④对于一些中国分析家来说,中国与美国的实

① 五项原则包括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相互不侵犯、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和互惠互利,以及和平共处。阎学通想像中的多极世界将在10至15年内出现。这将是一个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世界,而且中国在这个世界中更具备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能力(不清楚为何崛起后的中国仍把自己视为发展中国家)。还有,在这个世界中,强调集体和国家利益的东方价值观比强调个人主义(即个人比国家或团体更重要)的西方价值观更具影响力。可参见阎学通:《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355页。

② 在Michael Pillsbury的书中,他指出这个问题存有多种看法,见Pillsbury,“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可是,华盛顿的许多人士在引用他的研究成果时,却忽视了这一点。

③ 见Wang Jisi,“Multipolarity versus Hegemonism,” p. 4。这种描述是那些拥护“新思维”的中国学者(他们认为中国从美国创建的一些国际机构中受益,所以他们对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不感到忧虑)所能接受的(1998年12月我跟一位思想库的专家就亚太国际关系进行的访谈)。

④ 可以参见邓勇对中国分析家不看好未来多极化趋势的分析,见Deng Yong,“Hegemon on the Offensive: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U. S. Global Strateg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6, No. 3 (Fall 2001), pp. 343—365。他贴切地把中国领导人的主观偏好描述为“中国乌托邦式的多极世界”,见第344页。还可参见David Finkelstein,“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Costs of a Conflict,” in Andrew Scobell, ed., *The Costs of Conflict: The Impact on China of a Future War*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rmy War College, October 2001), pp. 9—27。这篇文章估计中国相对实力弱于美国,并深入分析了这种相对实力导致中国在该地区奉行更谨慎的外交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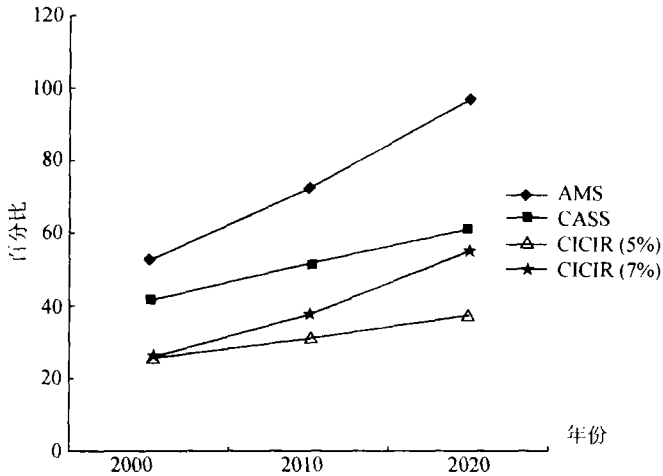


图-6 中国对其综合国力占美国综合国力百分比的变化趋势的估计(1990—2020)

资料来源:AMS(军事科学院)和CASS(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估计来自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p. 249, Table 10。CICIR 的估计是从以下报告所提供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综合国力评估系统:研究报告》,北京,2000年,第20页。

注:AMS指的是一位军事科学院的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所做的研究中对综合国力的比较趋势最乐观的估计。CASS指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研究所1996年所做的估计。CICIR(5%)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处有些相似的机构)的估计。这个估计假设中国的综合国力增长率为5%,而美国的综合国力增长率为3%。CICIR(7%)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另一个估计。这个2000年所做的估计假设中国的综合国力增长率为7%。

力和地缘战略能力上的差距意味着中国实际上不能成为一个海上大国。^①事实上,这意味着中国不能真正期望取代美国成为一个地区霸主。

最后,人们认为多极化最准确地描述了国际政治体系发生的变化,但这种观点相对于全球化等新概念来说似乎日渐式微。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中国的学

① 见唐世平:《再论中国的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第33页。

术期刊中提到全球化的次数要多于提到多极化的次数(见图-7)。^①全球化的观点承认,未来限制国家和国家主权(国内的经济选择、国内的文化选择,甚至外交政治选择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可能与物质的权力分配越来越没有关系,而与一个国家对全球资本、信息和技术流动的开放程度越来越有关。中国分析家基本上都认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一系列政策领域(经济、文化甚至如人权这样的国内管理问题)都会对国家主权和自治产生负面的影响。^②据一些分析家说,全球化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渗入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各国竞相争夺伴随资本而来的信息和技术所带来的好处(这种好处经常是有限的)。^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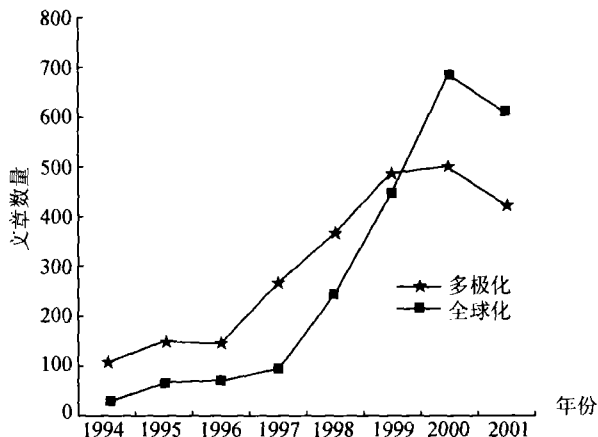


图-7 中国学术期刊提到“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次数比较(1994—2001)

注:以上的次数统计源于网上的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分类栏目,是用关键词搜索出来的。

① 令人关注的是,最近前外长钱其琛列出了他所认为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点问题。首要的是“信息社会”问题;其次是全球化问题。多极化并不在其中。见钱其琛:《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重点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9期,第5—8页。

② 比如,见黄世席:《全球化对国际法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1期,第28—33页;刘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307页。

③ 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刘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第304—305页;Thomas Moore,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in Samuel S. Kim, ed., *East Asia and Globalization* (Lanham, Md.: Rowan and Littlefield, 2000), pp. 111—118。这是少数用二手资料分析中国国内的全球化概念的一项研究。

据一些更开明的分析家说,全球化的比喻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中国对国际政治长期以来抱有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即国际政治是国家之间在国际权力体系中为了提高相对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决定一个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活力和寿命的不是这个国家的相对实力,而是它如何制定经济和外交政策,使之能够带来新的财富、地位和经济安全。一个国家在物质权力分配等级中所处的位置不比它在全球分工的增值生产中所占据的位置来得重要。^① 一些分析家认为在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内,单一民族国家不再是分析的主要单位,而只有在全球化这个框架内,才可以讨论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共同准则。^② 全球化概念中暗含的一个论点,即自力更生不再是可行的发展(或者安全)观念,特别是在面临跨国或者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走私毒品、犯罪、恐怖主义和生态破坏)的情况下,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致命性与经济和技术全球化有关。^③ 此外,全球化将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转变成了更复杂的、包括合作和对抗在内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相对平衡不是那么明显地由国际格局决定。^④

简而言之,多极化的论点不能成为说明中国领导人抱有改变现状目标的无懈可击的证据。不幸的是,最近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的大多数学术和专业分析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2002年美国国会授权的美中安全委员会报告。这份报告似乎把中国的多极化观点作为主要证据,证明中国一致认为美国的单极力量正在减弱。最近在中国进行的有关多极化的讨论就更清楚地表明,这一报告的结论在还没有得出前就已经过时了。^⑤

六、改变现状行为和权力分配

第五个衡量国家改变现状倾向性的指标(即对权力分配的行为)又如何呢?中国的外交姿态与它想成为地区性,甚至全球性霸主的战略目标是否一

① 一些中国分析家恰当地指出,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不再比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理论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政治。可参见王学玉:《从国际化到全球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8期,第52页。

②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15—16页。

③ 见王逸舟:《主编手记》,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梁光严:《全球化时代:当代国际安全的背景》,同上书,第25页。

④ 王逸舟:《多极化不等于反美》。

⑤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 S. -China Security Renew Commission.*

致? 同样,能证明这一点的论据并不明确。虽然多极化的讨论反映一种长期的愿望,但它不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中国近期和中期的对外政策。虽然中国政府对多极化表示无比的支持,但它在推动多极化形成方面却没有采取太多具体行动。按国际关系理论的说法,一国为了削弱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相对权力及影响力所采取的对策可称为制衡策略。一国采取制衡策略的典型做法是动员内部的经济、科技和人力资源,并把这些资源转化为军事或战略力量,或者在外部寻找拥有共同利益(即都想与一个较强的霸主或主导国对抗)的国家一起行动。有时候,一国也可以两种做法并用。那么中国是否正在该地区针对美国实行制衡策略呢?

毫无疑问,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推动军事现代化计划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要发展力量以阻止或减缓美国军事力量在东亚的延伸。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在目前和中期所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台湾,而不是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存在,也不一定是其他的军事突发事件,如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危机,更不是如何把中国的实力投送到其境外的问题。^①就是说,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必须对台湾动武的时候,削弱美国军事介入的能力。目前,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目标主要不是为了抢夺南海的岛屿。近年来,中国国防开支的实际增长率在大幅度上升(2000年为18%,2001年保持这个增长率)。尽管如此,我们是否可以把国防开支的增长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制衡策略呢?这并不清楚。至少,均势理论没有解释清楚在哪些方面的国防开支或多大幅度的国防开支的增长才构成制衡策略的问题。国防开支不是对外部威胁和机遇简单的反应,它也受科技创新周期、部门利益及国内意识形态的影响。此外,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看,中国国防开支还未达到那种可以让我们断言中国正在军事化并动员其经济资源来制衡美国权力的程度。

至于外部制衡的做法,中国并未努力试图构建反美同盟,或者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削弱美国的同盟,至少没有达到冷战期间美苏竞争的那种程度。虽然中国与俄罗斯签订了友好条约,但把该条约称为反美条约是荒谬的。普京总统

^① 中国军队另一项重要目标是保护中国的“经济重心”,而这已从毛泽东时代的内陆地区转移到邓小平时代的沿海地区。为此目标而发展的防御能力,与在台海爆发战争时所需的迫使美军远离中国沿海地区的能力相似。可参见 Finkelstein, *China's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pp. 17—18。

及其顾问的基本想法是依靠与欧洲和美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来发展俄罗斯的经济。从战略角度看中俄关系,俄罗斯给中国提供最大的好处是军备武器的供应,而不是因为它是与中国在各个场合跟美国对抗并抗衡美国的权力和利益的战略伙伴。俄罗斯主要的动机似乎是经济利益,即支撑陷入困难的俄罗斯的工业和工人,而不是为了反美的战略目标。此外,连那些被人们认为是中俄为对抗美国而采取的共同立场,也往往起到巩固或维护国际制度现状的作用(比如,加强联合国作用的立场及维护《反导条约》等现存军控协议的立场)。^①

中国似乎也没有那么积极地试图分裂美日或美韩同盟。中国官方的一贯立场是外国势力(如美国,而之前是苏联)应该退出这些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分析家和政治评论家一般不把这一立场当真,所以他们不用这种立场来证明中国当时是一个改变现状国。^②

更重要的是,实际上中国领导层并没有很明确地反对这些同盟。目前,中国外交的一个主要工具是运用宣传语言,即批评该地区以“冷战思维”为基础的双边军事同盟是过时的。^③取代这个概念的是所谓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倡导一个由多边机构及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稳定双边关系所构成的亚太地区。这种宣传性语言在该地区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而且对美国的同盟关系几乎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挑战。比如,中国没有(目前还没有)利用经济或军事威胁^④,或者通过隐蔽的金融手段干预日本和韩国国内的政治讨论,来

① 见 Alexander Lukin, *Russian Images of China and Russia-China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Brookings, 2001), http://www.brookings.org/fp/cnaps/papers/lukinwp_01.pdf. 作者对中俄战略合作的动机和局限性做了深入的分析。

② 中国一位现实主义学者不久前表达了同样的希望。可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页。他希望外国势力从该地区逐渐撤退,取而代之的是该地区各国承诺不加入针对第三方的同盟并承诺参与广泛的多边结构。这个多边结构将包括预警机制、更高的军事透明度以及积极的预防性外交委员会等措施。

③ 中国在一些场合,如东盟地区论坛,所展开的小规模进攻性外交举措旨在限制美国的双边同盟活动。不过,该地区各国领导人都认为这些举措对破坏美国的同盟关系不起什么作用。中国在1997年试图说服东盟地区论坛让成员国自愿地邀请第三国家以观察者身份参与它们的联合军事演习(主要是美国及其盟国举行这些演习,而中国不举行)。这更多地反映了人民解放军而非外交部的偏好,并且遭到其他东盟地区论坛成员的强烈批评。中国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我在1996、1997和1998年与中国、加拿大及美国的外交官、分析家和军官进行的访谈)。

④ 当然,这不包括中国与美国为了台湾而濒临战争之时,中国将会因为日本参与美国的干预行动而进行军事报复的可能性。不过,一些解放军人士指出,攻击美国在日本的军事目标将犯政治上的错误。

推动两国国内的反同盟力量的政策。其实,原因也许在于:中国反对同盟的笼统性和语言的夸张性与中国认识到一些同盟符合其利益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

比如,美韩同盟符合中国维持朝鲜半岛现状的利益。^① 中国似乎认为韩国跟它有共同利益,两国都希望朝鲜能以所谓的“软着陆”方式(即推动渐进式的国内改革过程及在外交上获得美日的接受)继续执政。而朝韩两国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排除贸易和人员往来的障碍。这样,韩国的利益也会抑制美国采取导致朝鲜发生所谓“硬着陆”(即朝鲜迅速解体)的鲁莽行动,以及试图推动在韩国主导下的朝鲜半岛统一。中国领导人倾向于保持目前地缘政治的现状。有的中国分析家间接指出,朝鲜半岛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源头是朝鲜:朝鲜可能发生政变和经济崩溃,进行更多的常规导弹试验,或发展核武器。^② 因此,中国似乎认为保持朝鲜半岛稳定需要限制朝鲜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鼓励朝鲜大体上按中国的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发展和有限的市场化,以及确保涉及朝鲜半岛问题的主要国家(如朝鲜、韩国、中国、美国和日本)保持稳定的政治关系。^③ 这显然是中国在过去10年中给朝鲜传递的信息。国际社会一

① 对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利益的深入分析,见 Tang Shiping, “A Neutral Reunified Korea: A Chinese View,”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Seoul), Vol. 13, No. 2 (Fall/Winter 1999), pp. 464—483; Avery Goldstein, “Across the Yalu: China’s Interest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 Changing World,” paper prepared for 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Conference in Honor of Allen S. Whiting.

② 见几位人民解放军战略家所做的分析,朱阳明主编:《亚太安全战略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③ 见 Zhang Yunling,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China’s Role* (Beiji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1),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28_yts/wordch-en/en-zylen-peace.htm。截至这篇论文,如想说明最近的朝鲜核危机(导致这个危机的原因是朝鲜威胁不遵守“限制发展核武器计划”的承诺,除非美国正式对它许下不侵犯的承诺)将会导致中国对美韩同盟的政策发生怎么样的变化,还为时过早。目前,中国和韩国的政策偏好比美韩的偏好更接近。中韩两国都认为美国威胁要在经济和政治上进一步孤立朝鲜的行为,将会是适得其反。不过,有一些迹象显示,中国领导人对朝鲜玩弄核外交的做法已越来越厌烦。时殷弘在2003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利益明显受朝鲜获取核储备的做法所威胁。该文暗示说,美中的利益有些趋同,即两国都想尽快和彻底地结束朝鲜的核计划。他指出,目前朝鲜应该肩负化解朝鲜半岛危机的主要责任。时殷弘的文章可能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因为是《大公报》(一份有时候反映中国领导人对重大问题看法的香港报纸)刊登了这篇文章。见 Shi, “How to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the Korean Nuclear Crisis,” *Ta Kung Pao*, January 15, 2003, <http://202.83.203.133:8080/news/2003-1-15/ZMTG-95064.htm>。至于中国对朝鲜的行为的愤怒和忧虑是否会导致它顺从美国对朝鲜的挑衅所采取的军事反应,将取决于中国的其他考虑,如朝鲜将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新政权,以及它跟美韩同盟将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美中官员并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担心如果它和美国讨论朝鲜政权垮台的各种方式,将导致中朝关系恶化。

致认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发挥了比较有建设性的作用。这包括敦促朝鲜限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约束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制度(冻结朝鲜生产铀计划的1994年框架协议和后来为朝鲜提供能源所设的KEDO)和推动四方会谈(会谈在1999年启动,当时旨在正式结束朝鲜半岛战争,会谈参与方包括中国、美国、韩国和朝鲜四方)。^①

韩国和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很大的共同利益。人们所做的预测显示,倘若促使半岛快速统一,韩国必然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按1998年的估计,如果在2000年以朝鲜发生“硬着陆”为条件实现统一的话,韩国在无法预期的一段时间内的开支可达2千亿至1.2兆美元。^②)韩国要维持现状的根本利益和它对朝鲜的不安全感有直接关系,而美韩同盟正好能让韩国感到安全。^③

长远来说,中国的一个主要忧虑是,倘若没了朝鲜,美韩同盟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战略分析家担心朝鲜半岛统一后,美国将保持其军事存在,而更糟的情况将是美军将越过三八线。毫无疑问,中韩发展军事交流源于中国的忧虑。朝鲜继续存在,可充当美中之间的缓冲区。

中国对美日同盟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自美日两国于1996年宣布修改《美日安保条约》的指导原则(此原则旨在明确日本在该地区的美国军事行动中扮演何种角色)后,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担心美日将利用此同盟来支持与中国大陆隔离的台湾,甚至支持台湾的正式“独立”^④。不过,不少中国分析家认为,

① 直到最近的朝鲜核危机,中国领导人可能认为,朝鲜利用其潜在的而不是已部署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来向美日韩榨取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不过,中国的这种想法可能已经发生变化,见 Shi, “How to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the Korean Nuclear Crisis”。

② Marcus Noland, Sherman Robinson and Li-gang Liu,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anford, Calif.: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March 1998)。

③ 见 Yu Bin, *Containment by Stealth: Chinese Views of and Policies toward America's Alliances with Japan and Korea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lif.: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March 1998), pp. 10—11。该书作者对美韩同盟的态度比较轻松。最近,韩国国内出现对美韩同盟不满的迹象,部分原因是韩国意识到布什政府在处理朝鲜问题时忽视了韩国的利益。因此,尽管中国不做什么,美韩同盟也可能会弱化。

④ 赵子聿:《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朱成虎主编:《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363页;杨伯江:《日本冷战后的安全战略》,阎学通主编:《中国与亚太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卿文辉,孙辉:《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第5页;军事科学院战略部:《2000—2001年战略评估》,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只要美日同盟不给“台独”势力提供军事保护,一个受美日同盟框架束缚的日本总比一个不受束缚的日本好。一些比较深入的分析指出,在后冷战时代,美日同盟的目的已从只对日本起“瓶盖”作用转变为兼对中国和俄罗斯起限制作用。^① 中国领导层最担心美日同盟的所谓“第二项目标”,即利用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牵制中国,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因此,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国针对美日同盟所展开的外交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旨在争取美日许下可信的承诺:在台海两岸发生冲突时不会启动美日同盟支持台湾。中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并不成功。^② 此外,有的中国分析家提出一些建议,如何让一个弱化的美日同盟与地区多边机构共存,并让它服从于这些机构。可是,这些想法并未被充分展开。

简而言之,中国领导层目前希望看到美日同盟回到1996年前的那种形式和功能,即限制日本的军事力量和协助美国约束朝鲜,并不希望它完全消失。^③ 中国分析家往往谨慎地声明,他们反对的是美日同盟的加强或巩固,而不是该同盟本身。^④

中国分析家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人暗中指出,中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适得其反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的对日政策过于受中国历史反日本帝

① 见金熙德:《美日同盟关系》,张蕴岭主编:《伙伴还是对手》,第260—261页。甚至有一些解放军分析家暗示,美国想要利用美日同盟来控制日本,并对付中国和俄罗斯。可参见中国军事科学院:《2000—2001年战略评估》,第81页。

② 见 Wang Jianwei and Wu Xinbo, *Against Us or with Us? The Perspective of America's Alliances with Japan and Korea* (Stanford, Calif.: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May 1998), p. 33。中国想得到一项声明,即美日在修改美日条约的时候不把台湾包括在条约范围内。见军事科学院:《2000—2001年战略评估》,第83页。

③ Thomas J. Christensen 指出,这种对美日同盟视条件而定的观点和中国的务实偏好(不愿看到日本成为未来多极世界的独立一极)是一致的。见 Christensen, “China,” p. 30; 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 49—80。

④ 金熙德:《中日伙伴关系的确立和未来发展》,张蕴岭主编:《伙伴还是对手》,第205和258页;军事科学院:《2000—2001年战略评估》,第83页。其实,提高地区多边组织的相对重要性的建议背后有一种非常隐晦、温和的对安全困境机制的敏感论述。这不是简单的反美或只关注台湾的论述。这种论述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和一个停滞的日本将导致它们之间权力对比的变化,因此中国必须设法消除日本的忧虑,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当然,美国的同盟也能做到这一点,但这将损害中国的利益。因此,另一种做法是建立一个可信的多边机构,并通过中国在这些机构中的行为来消除日本对它的忧虑。有关这种论述,可参见唐世平等:《东盟、中国、日本合作及东亚的未来》,《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6期,第19—24页。

国主义侵略的情绪影响,并且还低估了中国从中日关系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这些战略分析家理解安全困境的动态,代表了一种思想上的突破,因为这表明至少有一些中国分析家了解中日关系。¹ 此外,其中一些分析家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总体上已受到控制。抑制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因素很多,包括美日同盟、日本在二战后实施的政治变革、日本民众吸收了爱好和平的价值观、日本近十年来陷入经济泥潭、日本政治家实事求是地认识到把近邻视为敌人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以及中日两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² 根据这些论据,这些战略家坚决认为,中国的对日政策应该减少情绪化的成分。这将有助于防止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和右倾主义的激化。³ 此外,与美国和日本发展友好关系将有助于避免美日同盟不断加强。⁴ 有趣的是,反过来推论,这种观点承认了对美日两国奉行强硬政策将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这些都是公开讨论和激烈争议的观点。⁵ 但这似乎代表了目前的主流观点。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从1999年到2000年会改变对日政策,开始奉行所谓的“微笑外交”。从中国对日本在2001年秋季提出派遣其海军部队协助美国对付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所表现的相对沉默态度,就可以察觉到中国对日政策的变化。

最后,制衡策略本身似乎存在一种矛盾:尽管美国的相对军事实力在急剧上升,但自冷战结束后,中国在经济上却越来越依赖美国。在2002年,美国已

¹ 比如,国防大学军官朱成虎大校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见朱成虎:《中日关系:利益与情感》,《环球时报》1999年7月30日;马立诚(人民日报评论员):《对日关系新思维》,《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第41—47页;冯昭奎:《关于中日关系的战略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1期,第1、12页;金熙德:《中日伙伴关系》,第207页。

² 朱成虎:《中日关系:利益与情感》;金熙德:《中日伙伴关系》,第205和207页。对地区安全问题持现实主义观点的阎学通并没有把日本包括在该地区的主要大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内。见阎学通:《中国冷战后的安全战略》,阎学通主编:《中国与亚太安全》,第39页。

³ 朱成虎:《中日关系:利益与情感》;冯昭奎:《关于中日关系的战略思考》; Gilbert Rozman, "China's Changing Images of Japan, 1998—2001: The Struggle to Balance Partnership and Rival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2, No. 1 (February 2002), p. 113.

⁴ 金熙德:《美日同盟关系》,第301页。

⁵ 比如,有些解放军分析家担心日本舆论不再对日本军事扩展起约束作用。见杨运忠:《日本加速向军事大国目标迈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2001年,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28_yts/wordch-en/ch-ddytt2002/ch-qkddy0205yyz.htm。其他的分析家想对日本在侵略中国历史上不表示忏悔的做法进行报复,即把与日本的经济联系转移到欧洲和美国。见冯昭奎对这种观点的批判,见《关于中日关系的战略思考》,第12页。

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大约占了中国总贸易额的16%。^① 中国从美国进口关键的商品,如飞机和电子半导体。在2001年,美国签订的对中国(不包括香港)的直接投资额位于发达国家的前列。^② 美国在中国某些产业部门(如汽车和电讯)的直接投资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按现实主义派的说法,虽然中国是一个较弱的国家,却能在中美贸易中获取巨大的盈余。因此,这一关系的存在能让一个相对弱的中国获得更多的好处。这种说法是有些可取性的,但必须以一项假设为前提。这项假设是,我们能够精确地估算,在流入中国的净经济资源中,有多少是可以或者已经被转化成阻止美国在亚太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的军事力量。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关系导致中国经济对美国市场和资本的依赖。而经济增长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和长期执政能力有直接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战略产生了经济、社会和科技领域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而鉴于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不发达性,一旦经济增长带来的一切都消失了,这对中国政府的打击将比对美国的还要大。

此外,这些相互依赖的关系在中国国内导致了一些利益集团的出现。这些利益集团并不一定对美国持不友好的态度,也不一定对中国奉行的所有对外政策都表示支持。倘若台湾问题引发一场重大的冲突,中国东部将陷入战争状态,那么中国沿海地区的利益也将受损。在中国城市人口中正崛起的中产阶级也许比中国其他社会阶层(包括军队)更不支持过于强硬的反美外交路线。

与此相关,对于日本的经济困境,中国主要担心这将给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什么影响,而并不是关心这将对制衡美国的力量带来什么帮助。假如中国领导人追求的是完美的制衡战略,那么他们应该更希望看到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因为一个经济衰弱的日本将不能满足美国对它提出的所有军事要求。但中国领导人却担心日本经济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跟美国领导人一样,他们对日本过高的国债和银行破产问题感到担忧,因为这将影响日本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市场和资本的能力。

由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中国领导层在此刻似乎不愿意动员

① 我要感谢美中商业委员会的罗伯特·卡普(Robert Kapp)为我提供这些数据。

② China Statistical Data, <http://www.china.org.cn/e-company/02-06-20/web020417.htm>.

全部经济力量搞军事化来积极制衡美国在该地区(更别说是全球)的权力和影响力,并且不愿为此付出沉重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中国制衡美国单极地位的做法,至多只能被描述为(套用一位敏锐的学者的话)是“犹豫不决的、低调的,以及前后不一致的”^①。

有一个例外可以支持中国想制衡美国的说法,这就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所做的军事反应。中国奉行不对称战略,对远程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潜艇能力进行的适度改善,以图延缓美国在中国对台湾速战速决时的反应。^②中美两国就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性不可低估。中国对保护台湾主权完整做了象征性的承诺,而美国则担心其朋友和盟国会对它许下的提供军事保护的诺言失去信心,这两种考虑之间的互动导致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不断上升。如果中国准备跟美国及其亚洲盟国进行战争,那么其后果将不会局限于台湾的邻近地区,战争的负面影响将会涉及整个地区。^③如果中国在该地区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有限的,即防范“台独”或强行实现两岸统一,那么上述局面将可能出现。这里似乎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正准备通过武力途径改变台海两岸的实际政治和军事状况。然而,中国对美国干预台海冲突所做的准备实际上不等于说中国在该地区或更大的范围内要制衡美国。我并不是要为中国在近几年来防止台湾“独立”所奉行的高压外交找借口,而是因为我们不能从中国领导人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上简单地得出中国对该地区长远的权力格局以及全球制度和“游戏规则”的态度的笼统结论。

当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中国正在积极和彻底地改变该地区或全球的权

① 见 Deng Yong, “Hegemon on the Offensive,” p. 359。美国国防部在 1998 年宣称:“尽管中国没有领导一个派系或一组国家跟美国直接对抗,但中国的国际政治活动和某些经济与军事政策旨在达到同样的目标。”见“Report to Congress Pursuant to Section 1226 of the FY98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uture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Defense, November 1998, <http://www.fas.org/news/china/1998/981100-prc-dod.htm>。换句话说,美国国防部认为,中国在奉行内部(而不是外部)制衡政策。

② 比如,关于中国对台湾采取有限封锁的战略,可参见 Thomas J.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 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2001, pp. 5—40。

③ 日本很可能会履行对美国所做的承诺,协助美国保卫台湾。美国也可能对澳大利亚施压,让它参与美国的行动。这导致的负面影响将取决于战争的范围(比如,台湾或美国是否会对中国大陆进行轰炸)、持续性、激烈程度。

力分配结构并不意味着中国不想这么做。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分析上述遇到的问题,即那种认为中国在多方面表现出改变现状行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目前用来支撑这种说法的证据最多是模棱两可的。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担心美国有意保护一个与中国大陆永久隔离或正式“独立”出来的台湾。这种担忧可能会使中国国内抱有不切实际的改变现状目标的利益集团壮大,而反过来,这将为那种认为中国有长远改变现状目标的说法提供权威性的论据。比如,美国改善其远程精确攻击能力的做法将使中国担心自己保护领土完整的能力,而这意味着中国将会把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范围向外扩展。^① 不过,我们从中国在该地区或全球范围内的对外政策中似乎看不到它在台湾问题上所表现的那种改变现状的倾向。对台湾的政策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例外,然而它还仅是例外。

七、结 论

本文认为,由于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判断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维持现状还是改变现状采取了较为严格的标准,我们就难以得出以下结论,即中国显然是一个在所谓国际社会的边界之外(或者几乎不在边界之内)的改变现状的国家。然而,就一个国家在全球主要问题上认同于国际社会的程度而言,中国已经融入了各个国际组织,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合作。此外,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中国领导人正在积极努力抗衡美国的力量,试图破坏一个美国主宰的单极体系并用一个多极体系取而代之。有关多极体系的论文并不能指导我们清楚地了解中国的倾向,而且从行动上,中国现在似乎无法有力抗衡美国的军事力量或中国领导人所定义的美国利益。

然而,对于一个国家的政策而言,改变现状的“质量”和“数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有两个主要因素可能会影响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倾向。一是国内的社会动荡。对中国来说,全球化意味着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大主题下,在相对缺乏

^① 比如,在冷战期间,美国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不履行对一个盟国的承诺,这将影响其他盟国对美国的信任。因此,为了确保盟国对它的信任,美国把军事力量扩展到全球范围,而这相应地也需要大部分国家在政治上对它表示顺从和尊敬。从而,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力量扩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几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美国根据地缘政治制定的遏制目标和美国为了维护其全球同盟体系所奉行的攻击性军事姿态。

管理的情况下勇往直前地争夺短期利益。它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收入差距、社会不公正、环境恶化和公共卫生危机等问题。面对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公正,也许只有依靠保持各个社会经济群体相对较高的绝对收入增长率,才有可能维持社会稳定。不难想像,社会动荡会导致一些政治倾向的出现。这些倾向不同于那些有利于中国国内以及目前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分工状况的政策倾向。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宣传革命的改变现状国家变成了一个倾向于维持现状的国家。但是,一个并非不合情理的可能是,一种更加根深蒂固的改变现状的思想可能会由于以下问题而出现,这些问题包括:市场化设想的幻灭、内部分裂或者台湾重新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盟友。事实上,由于安全困境的动态化和治理不善的市场化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也许可以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一阶段视为中国采取倾向维持现状的外交政策的时期。这将取决于较为自由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倾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融入政治进程。目前,具备此类观点的主要群体是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精英,至少在外交政策上是这样。然而,现在还不清楚,此类倾向会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在政府应付国内严重骚乱的过程中。

第二个因素是一种逐渐出现的安全困境。在这种困境下,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改变现状的政策和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反应,将导致双方都认为对方与自己的基本安全利益是根本对立的。用于证实这种中美安全困境相互作用的证据是富有启发性的,但又是令人不安的。从原则上说,如果安全困境能够在辩论中体现出来,那么我们会看到交锋的频率和激烈程度上升。双方的强硬派一定会拿对方的说法作为自己的论据,来说明对方在威胁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和利益。

在行动方面,如果安全困境正在出现,我们就一定会在双方的行动中看到更大的相互作用或内部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应该不止是简单的互动。确切地说,我们可以期待一个过程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一方的合作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被对方置之不理,甚至往往被视为不合作行为,而且,不管是冲突行动还是合作行动,得到的回报都是冲突行动。另外,我们可以期待,随着双方对对方的行动变得越来越敏感,这种愈发充满恶意的相互往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快。也就是说,随着双方在监视对方一举一动的过程中变得愈加警觉,行动与报复之间的平均间歇时间会缩短。

今后,我们必须密切注意一些指标。在这些相互作用中,有一些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晚期,在被双方认为是对方态度的决定性证据的文章中,似乎出现了几段相互作用的时期。双方对对方维持现状倾向的怀疑态度使得少数高调文章颇为引人注目。据说,这些文章进一步证明了对对方构成的潜在威胁。^①强硬派把这些文章与背景分割开来,认为它们代表了对方的一致观念。从本质上说,其中一方所选择的作为“因变量”的文章恰好成为另一方所选择的同样作为“因变量”的文章。

在行动方面,自从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演习和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以后,中美两国军队都开始加紧为可能与对方发生的冲突拟订作战计划和举行军事演习。例如,在美国方面,它与台湾的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准同盟,合作范围日益扩大,共同探索进行武器转让、理论改革、军事行动的共同操作性、卫星地面传输以及美国参与台湾军事演习等各个方面。^②最近一期美国《四年防务评估》可能给出了最清楚的说明。美国军方认为,对于美国力量而言,日益崛起的中国是最主要的长期军事威胁。^③在中国方面,大部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行动理论的内部刊物似乎都假设(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需要筹划对付的主要军事对手。^④中国近期从俄罗斯购买的军事技术好像都是为了提高自身能力,来威慑或阻止美国为保护台湾而采取军事行动。

此外,其中一方的合作行动常常被另一方视为不合作行为。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甚至对美国一些相对友好的提议也持怀疑态度。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

① 常被提及的此类文章包括:[美]白礼博、孟儒著:《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许绶南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宋强等著:《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乔良、王湘穗著:《超限战——对全球化时代战争与战法的想定》,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关于美台军事关系的演化发展,可参见 Steven Goldstein and Randall Shriver, "An Uncertain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China Quarterly*, No. 165 (March 2001), pp. 147—172。关于卫星地面传输的合作,可参见 "U. S. to 'Conditionally' Share Military Data with Taiwan," *Taiwan Defense Review*, January 18, 2003; and "U. S. Troops to See Hankuang Drills," *Taipei Times*, January 23, 2003。

③ 尽管迫在眉睫的各种情况需要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但这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可参见王厚卿、张兴业主编:《战役学》,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30, 2001,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qdr2001.pdf>。

司令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及其顾问约翰·汉利(John Hanley)提出的在东亚建立一个安全共同体的建议从根本上遭到误解,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项建议直接源于对一些建设性观点的解读。这些观点认为,一旦建立此类安全共同体,其成员就不可能接受国家关系中出现的暴力冲突。这样一项建议及其理论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与布什政府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强硬派的强权政治思想是对立的。然而,中国的一位分析人士草率地理解了这项建议,认为美国更具恶意的企图,其目的在于防御日益崛起的中国。^① 在美国方面,美国政府官员则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及其他各种安全对话中的多边外交活动旨在破坏美国在该地区的同盟和势力,同时中国还对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产生了兴趣(例如,“10+3”经济论坛就是由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组成的)。

美国担心中国在该地区的多种计划可能带有恶意。这种担心已经转化为遏制中国力量的具体军事和政治措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一般人都认为美日条约的修改原则是防止日本在朝鲜半岛危机中背信弃义。然而,在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过去后,中国毋庸置疑地成为这些修改措施的焦点之一。布什政府领导下的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准同盟,超越了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台协调水平。因此,在华盛顿眼中,美国对东北亚盟友所做承诺的可信度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它对台湾安全的承诺。

在某些方面,美国对于中国力量的矛盾心理已经转变成为遏制力量中的具体军事政治措施。中国领导人发现了这些遏制信号,并把它们全都往坏的方面想(只注意大棒而忽视了胡萝卜)。例如,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与中国的接触行为有时就被称作“软遏制”战略。布什政府内部或与之关系密切的一些权威人物曾明确呼吁对中国采取一套接触与遏制相结合的战略,但他们也不清楚怎样才能使北京确信这种接触行为不是诡计或战略欺骗。^② 所以,北京的许多

^① 关于布莱尔的建议,可参见 Dennis C. Blair and John M. Hanley, "From Wheels to Webs: Reconstructing Asia-Pacific Security Arrangements,"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2, No. 1, 2001, pp. 7-17. 作者公开引用了 Michael Barnett 和 Emanuel Adler 有关安全共同体的研究。关于中方对安全共同体建议的批判,可参见宋以敏:《亚太地区的几个新发展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9期,第12-13页。

^② Zalmay M. Khalilzad, Abram N. Shulsky, Daniel L. Byman, Roger Cliff, David T. Orletsky, David Shlappek, and Ashley J. Tell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99).

分析人士就认为美国遏制战略比美国自己所说的更加险恶,而不是像美国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预防不确定性而采取遏制措施。鉴于上述原因,出现这种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可能出现下面这种情况,即中国领导人变得对当前东亚(或者包括全球在内)的权力和影响力分配越来越没把握,这将影响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利益的界定。如果中国领导人对于维持现状的重要性发生认识变化,其重大原因之一则可能是他们认为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挑战他们界定的合法利益。中国合作或克制政策的长远意义,可能会因为中国对其他国家行为的理解发生变化而削弱(例如,认为美国已经违背了它在1982年许下的有关对台军售的承诺;美日同盟将在保护台湾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旨在破坏中国的威慑力)。然而,美国违背它在1982年许下的承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政策日益将焦点集中在中国,以及美国国防部推行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中国遏制美国干预台湾危机的政治军事努力互动有关。

安全困境动态的存在并不否认利益冲突的存在。但是,安全困境动态能够改变这些利益冲突的严重性和得失关系。某一方用来描述另一方的外交辞令常常会导致安全困境的恶化。最近对于美国周围地区种族冲突的研究结果显示,真正的利益冲突会因为一个族群认为其他族群将当前问题归咎于它自己而恶化。换句话说,不管处于险境中的真正利益冲突的性质如何,使用“定性语言”的谴责之词对于集团的关系会产生独立的破坏性作用。^① 定性语言归纳出另一方和自己一方的特性,认为对方应该在道义上为冲突负责。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2002年报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使用了这种带有归纳性的脱离历史的定性语言。在国际政治或战略与力量方面,中国被笼统地说成是与美国(有时是“西方”)截然不同的。同时,中国的官方言论也照例恢复了原来对美国(有时是“西方”)及其所谓对华怀有侵略意图的“一刀切”式定性描述,把中国描述成一个一贯爱好和平、不搞侵略的国家。中国与美国在语言风格上的趋同和语言内容上的对立,值得密切关注。如果两方面都达到极端水平,语言风格

^① Daniel Romer, Kathleen H. Jamieson, Catherine Riegner, Mika Emori, and Brigitte Rouson, "Blame Discourse versus Realistic Conflict as Explanations of Ethnic Tension in Urban Neighborhoo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14, No. 3, 1997, pp. 273—291.

就会成为两国领导人放弃寻找合作性方案解决利益冲突的预警信号。然而,一旦这种“趋同”和“对立”走向极端,它将严重影响双方对“利益”和“威胁”的定义。

如果安全困境机制真的能够解释中国的不满情绪和美国对于中国改变现状目标的认识的变化过程,那么约瑟夫·奈(Joseph Nye)关于“中国威胁”之自我实现特性的著名论断也许基本上是正确的。^① 同样,北京大学的两名国际关系学者叶自成和冯茵的论断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只看到美国国内反美势力的行动,将美国的一举一动视为敌对行为,从而采取针锋相对的对策,那么中国和美国彼此成为敌人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② 对于美国外交政策领域里某些一向比较倾向于强权政治并且公然妄自尊大的学派而言,这种观点的吸引力较小。同样,安全困境的观点在中国国内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它的必要条件是承认中国自己的行为产生了适得其反的作用,破坏了它自身的安全。^③ 因此,中国和美国的认识恰好能够激化安全困境动态,因为双方的领导人往往会忽视或低估此类机制的存在。^④

① 我认为,美中在东亚的关系受安全困境机制的影响,这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观点。除了约瑟夫·奈的著名论断之外,也可参见 Christensen, “China, the U. 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早已有学者对安全困境动态做了一些论述,可参见 Karl W. Eikenberry, “Does China Threaten Asia-Pacific Regional Stability?” *Parameters*, Vol. 25, No. 1, 1995, pp. 82—89。

② 叶自成、冯茵:《中美关系十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5期,第3页。

③ 不过,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有创新思维的分析家和战略家都知道中国的行为可能导致安全困境的后果,而这将对中国的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可参见张蕴岭:《综合安全观及对我国安全的思考》; Qin Yaqing, “Response to Yong Deng: Power, Perception and the Cultural Lens,” *Asian Affairs*, Vol. 28, No. 3, 2001, pp. 155—158; 唐世平:《再论中国的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第30页; 时殷弘:《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可有的和应该有的对策》,《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12—16页; 叶自成、冯茵:《中美关系十论》。安全困境的悲剧在于:那些了解安全困境动态的人,如果缺乏高层政治庇护,往往会被剥夺合法发言权,因为他们被视为太软弱、太幼稚,甚至可能被视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些思想家和分析师恰恰是美国希望能在中国政策辩论中发挥影响力的人。不过,当中美关系发生明显倒退时,这些人的威信也下降。显然,中国的政策辩论与美国的政策辩论有相似之处。

④ 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说:“如果国家政要理解这个困境,它将会变得更强烈。”见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78, p. 181。冷战结束的主要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总统意识到美苏关系中的安全困境机制。这促使他单方面做出希望降低与美关系紧张程度的信号,并推动苏联进行有限的非军事化进程。可参见 Matthew Evangelista, *Unarmed Forces: The Transnational Movement to End the Cold War*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Celeste A. Wallander, “Lost and Found: Gorbachev’s New Thinking,”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1, 2002, pp. 117—129。

我的观点并不是说,相对过去而言,现在更倾向于维持现状的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一定比过去更加友好或者更不偏好暴力。维持现状的国家,特别是那些陷入安全困境的国家,也有可能非常愿意使用军事力量来保护它们的领土、势力范围及其附属国。我的观点也不是说,一个更加倾向于维持现状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一定会减少。安全困境是个交往过程。它们能够导致对利益的重新定义,也能够改变两国中的一方或双方领导人的思想观念。维护《反弹道导弹条约》等活动曾经被定义为共同利益,但这种看法将不复存在。我的观点也不是说,中国领导人不愿意增强该国的相对经济和军事实力。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会愿意那样做。问题在于,他们愿意牺牲哪些其他利益作为代价呢?中国领导人似乎不愿在经济利益和中美关系方面付出太多代价。换句话说,变得更加富强的愿望还没有转变为取代美国成为地区或全球头号强国的相应军事行动。^①最后,我的观点也不是说,随着改变现状利益集团在整個中国外交领域里的地位降低和影响范围缩小,这种趋势今后就不会逆转。正如我所指出的,日益恶化的中美安全困境有可能成为改变现状再现的一个原因。为了避免安全困境的恶化,美国和中国应正视它们之间的安全困境,而非否认其存在。

^① 因此,中国目前的外交姿态并不符合摩根索或施韦勒对改变现状所下的定义。

作者简介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1992年)。著有《中国国家利益分析》(1996年)、《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合著,2001年),译著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2003年)。

电子信箱:yanxt@mail.tsinghua.edu.cn

江忆恩 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1993年)。研究兴趣为国际制度、身份认同和战略文化。著有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1995)。

电子信箱:johnston@fas.harvard.edu

朱毓朝 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皇后大学政治学博士(1996年)。曾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中国研究》(日本)、《二十一世纪》、《民族研究》、《世界民族》以及 *Issues and Studies*,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Pacific Review*, *American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电子信箱:yuchao.zhu@uregina.ca

郭钢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博士(2002年)。1997年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本科毕业,2001年获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东亚政治、比较政党和政治统计分析。

电子信箱:gg@olemiss.edu

周宝根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研究生。2000年东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2003年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硕士毕业。曾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电子信箱:zbg04@mails.tsinghua.edu.cn

秦亚青 外交学院教授,美国密苏里大学政治学博士(1994年)。著有《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1998年),译著有《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2000年)、《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2003年)等。

电子信箱:yqqin@cfau.edu.cn